

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

——以威廉姆森和哈特为代表的两种进路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综述了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两个分支——交易费用经济学(TCE)和产权理论(PRT)。TCE和PRT都把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作为共同基础,但在分析问题的重点和思路上有着严重的分歧。TCE认为契约不完全导致的交易费用主要源于事后的失调,因而强调事后适应性治理;而PRT认为契约不完全导致的交易费用主要源于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激励不足,因此强调事前的激励机制。如果能够在有限理性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那么将有望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这是未来的工作。

[关键词] 不完全契约;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引言

威廉姆森(Williamson, 2002a)将经济学分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选择科学”(science of choice)和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代表的“契约科学”(science of contract),可见“契约”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地位。当然,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通常是指“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即事前无法囊括所有或然事件的契约。不完全契约是相对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激励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中的“完全契约”而言的。

不完全契约的思想源于科斯1937年的经典论文(Coase, 1937),他指出“由于预测方面的困难,有关物品或劳务供给的契约期限越长,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买方也就越不愿意明确规定对方该干什么”。沿着科斯的思路,发展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两个分支:一支是以威廉姆森为主要代表的交易费用经济学(TCE),主张在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通过比较各种不同治理结构来选择一种最能节约事前和事后交易费用的制度,也称交易费用学派;另一支是以哈特(Hart)为代表产权理论(PRT),主张通过某种机制来保护事前的投资激励,也称新产权学派。这两支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近年来的进步。

本文结构做如下安排:先分别介绍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的基本逻辑、主要应用和实证检验,再将两者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最后是关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前景的思考。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 I: 交易费用经济学

1. 逻辑

交易费用经济学(TCE)的理论框架主要由威廉姆森(1971, 1975, 1985, 1996, 2000, 2002a)、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 1978)等人的工作构成,其中威廉姆森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TCE的理论营养源于19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学、法学和组织理论。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是TCE最重要的三个概念。

*[收稿日期]2004-08-12

[作者简介]聂辉华(1978-),江西崇仁人,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契约理论和企业理论。作者感谢Eric Brousseau、Oliver Hart、Paul Joskow、Louis Putterman、Daniel Spulber和Chris Woodruff对写作本文提供的帮助,周业安对本文提供了有益的评论。

TCE 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将每次交易视作一种契约。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在交易时不可能预见到未来的各种或然状况并以双方都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中，因此契约天然是不完全的。由于缔约各方都有机会主义倾向，都会采取各种策略行为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因此缔约后双方不可避免地出现拒绝合作、失调、成本高昂的再谈判等危及缔约关系持续地、适应性地发展下去的情况。考虑到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再加上交易涉及的资产具有专用性，因此求诸第三方（比如法庭）来维持契约关系，不仅成本巨大，而且可能根本无法证实。这就需要诸于一种私人秩序或者说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来“注入秩序，转移冲突，实现双方共同利益”（Williamson, 2002a）。不同性质的交易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的契约，对应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最优的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程度节约事前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因此，交易费用经济学也被威廉姆森称为“分离的结构选择分析”（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或者“比较经济制度分析”。

2. 应用

（1）纵向一体化与企业的边界。这是TCE的起点，也是TCE在企业理论方面最重要的应用。威廉姆森（1971）最先注意到企业（或科层）相对于市场的协调优势，并推断在契约不完全的条件下，资产专用性越强，交易就越是应该采取一体化的企业形式而非市场形式。克莱因等（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 1978）等用“可占用性准租”（appropriable quasi rents）表征“资产专用性”，强化了威廉姆森的上述观点。为了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分析组织形式，威廉姆森（1985）利用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将所有的交易划分为三种契约：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古典契约属于完全契约，对应于市场治理；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属于不完全契约，前者对应于第三方治理，后者包括双方治理和统一治理。除了市场治理，统一治理属于企业或科层（hierarchy），其他形式的契约或者交易都属于混合形式（hybrid）。威廉姆森推断，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交易越是频繁，不确定性越强，则交易越是倾向于由科层来组织。赖尔丹和威廉姆森（Riordan and Williamson, 1985）用一个数学模型说明了选择治理结构的基本原则是：简单的交易匹配简单的治理结构，复杂的交易匹配复杂的治理结构，使得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总和最小化。混合形式包括特许经营、长期契约（含网络联盟）、质押、互惠和管制等缔约方式。威廉姆森（1991）还深入分析了市场、混合形式和科层三种治理结构在激励密度（incentive intensity）、适应性（adaptation）、契约法（contract law）、行政控制和官僚成本等五个维度的差别。后来，又把官僚机构（bureaus）作为第四种治理结构（Williamson, 2000）。与以往的纯粹微观分析不同的是，威廉姆森（1991）用产权、契约法、声誉效应和不确定性4个参数代表制度环境，考察了制度环境与治理结构之间的比较静态关系。这弥补了威廉姆森（1985）关于不确定性与混合形式之间关系的模糊性。总之，伴随交易的复杂性和契约的不完全性的增加，治理结构应该是沿着“现货市场——不完全长期契约（混合形式）——企业——官僚组织”的路径演进（Williamson, 2000）。

（2）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在TCE看来，债务和股权是两种不同的治理结构而非单纯的融资工具，企业采取哪种工具的逻辑与纵向一体化过程中“制造”（市场）还是“购买”（市场）的决策逻辑是相似的。投资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契约越是复杂，投资风险越高，企业越是倾向于采取股权融资，反之亦反；而“债股权”则是介于债务和股权之间的混合形式（Williamson, 1988, 1996）。根据不同程度的专用性投资应受不同类型的保护的逻辑，威廉姆森（1985, 1996）分析了公司中六类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资本家或者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投入企业的资本通常是沉没成本，具有高度专用性，并且要承担最

在威廉姆森看来，每种治理结构都是有代价和适用范围的，不能将一种机制串换到另一种治理结构，否则组织的边界将是无限的。例如，威廉姆森（1985）认为不能在企业内引入高能激励（higher-power incentive）。

后责任，因此最需要以董事会的形式得到保护。董事会的本质就是保护股东的治理结构。一些长期贷款人所贷款项也具有专用性的特点，因此也可以考虑进入董事会并享有投票权。不过一旦没有呆坏帐的风险，那么银行就可能没有必要进入企业。劳工、供应商、客户、经营者和社区可以分别通过工会、付款方式、品牌担保、薪酬计划和基础设施等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投资，而无须进入董事会。

(3) 特许权经营、反垄断和政府管制。根据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有非标准契约都是反垄断的。威廉姆森(1976、1985)、克莱因(1980)从交易费用的角度驳斥了这种观点和相应的反托拉斯政策，他们把特许权经营、排他性销售契约、搭售等市场销售方式看作是保护生产商的专用性投资的治理手段。对于自然垄断领域的特许权竞标问题，威廉姆森(1985, 1996)指出了一次性契约、不完全的长期契约和定期续签的短期契约在竞标中只关注到事前的交易费用而忽略了事后交易费用以及再拍卖时的起点公平问题。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特许权经营除了拍卖还应该有更多的政府管制，因为自然垄断行业的特许经营契约带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完全性(也见Prager, 1990; Zupan, 1989)。

(4) 此外，阿尔特等(Alt, Carlsen, Heum, and Johansen, 1999)说明了国际竞争中企业的资产专用性与政治游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巴扎里和泰德利斯(Bajari and Tadelis, 2001)利用TCE的思路建立了一个采购模型，证明了契约越是不完全，就越是偏向于采取成本加成的契约而非固定价格契约。

3. 检验

对TCE的实证检验主要集中于案例研究，也有少量的大样本研究。早期的代表性实证检验有威廉姆森(1976)、克莱因等(1979)、克莱因(1980)、乔斯科(Joskow, 1985)，近十年来的代表性经验研究有舒兰斯基和克莱因(Shelanski and Klein, 1995)、莱昂斯(Lyons, 1996)、林弗莱曲和海德(Rindfleisch and Heide, 1997)、马斯滕和索雪(Masten and Saussier, 2000)等，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产业组织领域以及相关的经济领域。最近，伯纳和马奇(Boerner and Macher, 2001)对全世界超过600份关于TCE的经验研究做了一个综述，并涉及法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农业经济政策和卫生经济政策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主要的结论是，总体上TCE得到了经验支持，是“一个经验上成功的故事”(Williamson, 2002b)。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的检验指标有待精确，对交易费用的度量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交易频率对于治理结构的选择可能不是那么重要，资产专用性概念应该内生等。

三、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展 II：产权理论

1. 基础

以哈特为代表的不完全契约理论可称为产权理论(PRT)，它的主要框架由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等人的重要工作构成(Grossman and Hart, 1986; Hart and Moore, 1990; Hart, 1995a; 以下简称GHM)。PRT对不完全契约的理解建立在早期TCE的工作上(Coase, 1937; Williamson, 1985; Klein, Crawford and Alchian, 1978)。但是，PRT关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础却是在哈特等人(Hart and Moore, 1999a; Segal, 1999; 简称HMS)回应马斯金和梯若尔等人(Maskin and Tirole, 1999; Tirole, 1999)的批评中逐步完善起来的。综合GHM模型和HMS模型，PRT的基础和逻辑可以概括如下。

假定买方和卖方要交易一个小物品(widget)。自然状态和小物品的形状在投资生产前是不可预见的，因此双方只能缔结一个不完全的契约。假定双方都是风险中性的，无财富约

HMS模型部分地包含了Hart and Moore (1988)的工作。

束,利率为零。卖方单方面对小物品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投资的结果可能产生N种不同的小物品,但是在每种状态下只有一个“特殊品”被交易,而其余N-1个小物品的成本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如果当事人不能承诺不进行再谈判,那么当环境足够复杂,即当N趋于无穷大时,无论未来状态是否可以事先描述,卖方的专用性投资激励都将趋于0。此时,初始契约的价值就收敛于没有契约或者是“君子协议”(null contract)的价值。HMS模型在GHM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复杂性”,实际上只是在极限上为不完全契约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基础。最近哈特和莫尔(Hart and Moore, 2004)考虑了更一般的情况,他们把契约看成是一种结果的表单(a list of outcomes)。松弛型(loose)契约更具事后灵活性但是妨碍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而紧密型(tight)契约激励事前投资,但是可能事后是低效率的。最佳的契约在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之间权衡取舍。PRT导出的基本含义是:因为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应该设计一种机制保护事前(关系专用性)投资激励,实现次优社会福利效果。

2. 应用

(1) 企业理论。与TCE类似, PRT最重要的也是最初的应用领域是企业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企业的一体化问题或者说“制造还是购买”(make-or-buy)问题。根据经典的GHM模型,因为契约是不完全的,如果存在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必然发生敲竹杠行为。因此,合意的做法是,由一方将契约中难以明确的这部分“剩余权利”(即剩余控制权)购买过去。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组物质资产的集合,剩余控制权就是产权。获得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将因此增加投资激励,而失去剩余控制权的一方则将减少激励。如果增加的激励所提高的生产率足以弥补减少的激励所损失的生产率,那么这种权利的转移就是帕雷托改进的。具体地,如果双方资产是严格互补的,那么就应当采取某种形式的合并;如果一方的人力资本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就应该获得产权或剩余控制权;如果双方人力资本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无论哪种形式的合并都是一样的。GHM模型从产权和激励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这相对于传统的框架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当然,这一模型尚待完善。GHM理论对于谈判解的使用非常敏感,如果使用不同的谈判解(如Rubinstein轮流出价解)来分配事后盈余,在投资者的外部选择权(outside option)起约束作用时(binding)就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论,此时恰恰是没有资产的一方更有激励进行专用性投资(Chiu, 1998; De Meza and Lockwood, 1998; Rajan and Zingales, 1998)。为了改进GHM模型,哈特和霍姆斯特朗(Hart and Homstrom, 2002)将视角从资产(asset)扩展到活动(activity),假设一个企业的活动具有(正的、负的)外部性,老板或管理者具有货币利润和私人收益。他们认为,企业合并的好处是可以将正的外部性内在化,但是代价是丧失部分私人收益,因此最佳的企业规模将是对两者的权衡取舍(trade-off)。蔡(Cai, 2003)在一个模型中将专用性投资行为内生,进一步完善了GHM模型。

(2) 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阿洪和博尔顿(Aghion and Bolton, 1992)首次将PRT的思想应用于金融契约理论。他们在一个不完全契约的框架下考虑了公司控制权在资本家(债权人)和企业管理者(债务人)之间的转移问题,基本结论是:如果一方的个人利益与总利益不是单调增长的,那么就应该将控制权转移给对方;如果双方的利益都不与总利益单调增长,那么相机控制(contingent control)是最优的。但是哈特和莫尔(Hart and Moore, 1989)认为相机控制模型没有抓住债务契约的一个重要特征——未清偿债务造成控制权转移,于是他们设计了一个含有资产清算的最佳债务契约。继而,他们将该模型扩展到多个时期的情况,认为资产期限应当与债务期限相匹配(Hart and Moore, 1994)。哈特(Hart, 1995b)综合

Aghion、Dewatripont and Rey (1994)、Hart and Moore (1999a)也考虑了不允许再谈判的特殊情况,此时结果可以与社会最优一致。

拉詹和津加莱斯更考虑了“通道”(access)也可以作为一种鼓励专用性投资的手段,以弥补产权激励的不足(Rajan and Zingales, 1998)。

上述思想，考察了在不完全契约下公司治理的含义和政策。

(3) 政府采购与公用事业民营化。政府何时应该自己提供一项服务，何时又该将服务外包出去？哈特、施莱佛和维什尼（Hart, Shleifer and Vishny, 1991）假定政府的采购契约是不完全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是不可明确的，既可以任免一个官员来提供，也可以外包给一个私人来提供。他们认为，由于私人对提供服务的资产具有剩余控制权，因此比官员更有激励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但是私人会过于降低成本而忽略成本降低对质量提高的逆向效应。因此，政府的最佳范围是，如果产品或服务的成本降低对质量提高的逆向效应可以得到控制，或者提高质量很重要，或者官员对利益集团的庇护问题很严重时，更应该对公共服务采取私有化措施；反之则服务由政府内部提供。哈特（Hart, 2002）将这一思路拓展到更广阔的公用事业民营化问题上。

(4) 社会契约与政治制度设计。阿洪和博尔顿最近将不完全契约思想应用于社会决策程序的设计（Aghion and Bolton, 2003）。由于社会契约是不完全的，因此“一致同意”规则不可能实施，现实中只能实施某种形式的多数投票规则。最佳的多数投票规则在保护少数的好处和更多的事后灵活性、最小化补偿既得利益者的成本和最小化剥削少数人之间权衡取舍。

(5) 此外，哈特和莫尔（Hart and Moore, 1998）比较了合伙制企业与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在产权结构上的优缺点，还讨论了科层企业中的权威分配和授权问题（Hart and Moore, 1999b）。哈特还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讨论了规范（norm）与企业边界的关系（Hart, 2001）。

3. 检验

关于 PRT 的实证检验相对要少得多，因为剩余控制权在理论上定义就比较含糊，在实践中难以检验。最近贝克和哈勃德（Baker and Hubbard, 2002）以美国卡车行业为例考察了契约不完全时卡车所有权的配置。他们发现，司机是否拥有卡车取决于驾驶激励和谈判成本的权衡取舍。驾驶路程越长，卡车载货量越是难以测度，或者越是对装备具有单方面的要求，则产权越是应该配置给司机而非运输公司。这支持了 PRT 的结论。阿分贝因和勒纳（Elfenbein and Lerner, 2002）以 1995 - 1999 年间超过 100 份因特网接入联盟（Internet portals alliances）的契约为样本证实了不完全契约理论，发现对投资最重要的一方往往拥有所有权。

三、对比与思考

在分别对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的进展做了介绍之后，我们来将这两条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进路作一个简单的对比（如表 1），然后讨论一下不完全契约理论今后的发展问题。

表 1

项目	不完全契约理论	
主要代表	Williamson	Hart
理性程度	有限理性	充分理性
交易费用	正	正
执行力量	私人秩序	私人秩序
激励	事后激励	事前激励
企业定义	治理结构	资产集
边界决定	交易费用	产权
合并成本	官僚成本	激励损失
主要变量	资产专用性	剩余控制权

结合表1和前面的内容,不难看出,TCE和PRT在基础上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把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作为契约不完全的主要原因。当然,PRT所指的“有限理性”相对来说更趋近于完全理性,因此暂时称为“充分理性”(sufficient rationality)。但是两者却在分析问题的重点和思路上有着重大的分歧。TCE强调契约不完全导致的交易费用主要在于事后的失调,因而主张问题的重点在于契约的事后适应性治理;而PRT(尤其是GHM模型)对于交易费用的界定相对狭窄,认为契约不完全导致的主要问题在于影响了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激励,因此主张问题的重点在于事前设计一种机制来保护投资激励。在一体化问题上两者看上去分歧更加严重,PRT批评TCE忽略了一体化前后资产所有者在产权方面的激励变化(Hart, 1995),而TCE批评PRT忽略了一体化前后各方在激励密度、信息分布、行政管理和契约法等方面的差别(Williamson, 2000b)。对于TCE来说,应该考虑的是一种契约或交易应该匹配哪种治理结构;而对于PRT来说,应该考虑的是谁应该合并谁。有意思的是,在实证检验方面,索雪(Saussier, 2000)和沃德鲁夫(Woodruff, 2002)分别支持了TCE和PRT而同时否定了另一个理论。

然而实际上,两者的分歧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而且它们各自的缺陷也许可以由对方来弥补。TCE强调事后的适应性治理固然是对的,但是对于如何治理的过程TCE却保持了缄默,它甚至不能确定是谁来主导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Furubotn and Richer, 1991)。而PRT通过对产权的界定就避免了这个问题,但是PRT却忽略了不同组织或治理结构在激励密度、信息分布等方面的差别,也忽视了TCE所强调的官僚主义成本。只有将事前和事后两种交易费用结合起来,才能更真实、更全面地反映组织的边界和规模。相对来讲,TCE由于坚持有限理性假设,因此契约不完全的基础是坚实的,而PRT由于坚持一个比较“暧昧”的“充分理性”假设,因此在不完全契约的基础方面遭致了猛烈的批判。如果能够在有限理性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那么这个问题将不复存在。事实上,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容易注意到,TCE和PRT在公司金融、公司治理和政府采购方面导出的含义几乎是一致的。立足于同样的基础,沿着不同路径发展,最后有机地融合起来,我们认为这就是TCE和PRT的发展前景。

- Aghion, P. and P. Bolton, 1992, "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59: 473-494
- Aghion, P. and P. Bolton, 2003, "Incomplete Social Contract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forthcoming
- Aghion, P., M. Dewatripont and P. Rey, 1994, "Renegotiation Design with Unverifiable Information", *Econometrica* 62: 257-282
- Alt, James E., Fredrik Carlsen, Per Heum, and Kåre Johansen, 1999,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Firms: Lobbying for Subsidies in Norwa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 99-116
- Bajari, Patrick and Steven Tadelis, 2001, "Incentive versus transaction cost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2: 387-407
- Baker, G. and T. Hubbard, 2002, "Contractibility and Asset Ownership: On-Board Computers and Governance in U.S. Trucking", NBER Working Paper #7634
- Boerner, C. S. and J. Macher, 2001,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n Assessment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working paper
- Cai, Hongbin, 2003, "A theory of joint asset ownership",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4(1): 63-77

威廉姆森(Williamson, 2000)称之为“有选择的(selective)有限理性”。实际上,资产专用性并不是契约不完全的必要条件,TCE可以在没有资产专用性时存在,而PRT后期的模型都放弃了这一假设。

- Chiu, Y. S., 1998, "Non-cooperative Bargaining, Hostages and Optimal Asset Own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4): 882-901
- Coase,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386-405
- De Meza, David and Ben Lockwood, 1998, "Does Asset Ownership Always Motivate Managers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61-386
- Elfenbein, D. and J. Lerner, 2002, "Ownership and control rights in Internet Portal Alliances", working paper
- Furubotn, E. G. and R. Richter,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 Assessment", In Furubotn and Richter,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M Press
- Grossman, Sanford, and Oliver Hart, 1986,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691-719
- Hart, Oliver, 1995a, *Firm, Contract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t, Oliver, 1995b, "Corporate Governance: Some Theory and Implications", *Economic Journal*, 105(430): 678-689
- Hart, Oliver, 2001, "Norm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working paper; in *The Economics of Contracts* (2002)
- Hart, Oliver, 2002,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Public Ownership: Remarks, and an Application to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orking paper
- Hart, O. and B. Holmstrom, 2002, "A Theory of Firm Scope", mimeo
-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1988,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Renegotiation", *Econometrica*, 56:755-86
-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1990, "Property Rights and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6): 1119-1158
- Hart, Oliver and John Moore, 1994, "A Theory of Debt Based on the Inalienability of Human Capit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841-79
- Hart, O. and J. Moore, 1998, "Cooperatives versus Outside Ownership", working paper
- Hart, O. and J. Moore, 1999a, "Foundations of Incomplete Contrac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115-138
- Hart, O. and J. Moore, 1999b, "On the Design of Hierarchies: Coordination versus Specialization", mimeo
- Hart, O. and J. Moore, 1989, "Default and Renegotiation: A Dynamic Model of Deb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3: 1-41
- Hart, O. and J. Moore, 2004, "Agreeing Now to Agree Later: Contracts that Rule Out but do not Rule In", working paper
- Hart, Oliver and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1997,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1127-1161
- Joskow, P., 1985,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long term contract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 33-80
- Klein, B., R. Crawford and A. Alchian, 1978, "Vertical Integration, Appropriable Rents and the Competitive Contracting Proces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1: 297-326
- Klein, Benjamin, 1980, "Transaction Cost Determinants of "Unfair" Contractual Arrange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80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0(2)
- Maskin, E. and J. Tirole, 1999, "Unforeseen Contingencies and Incomplete Contrac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83-114
- Masten, Scott and Stephane Saussier, 2000, "Econometrics of contracts: an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s in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contracting", *Revue d'Economie Industrielle*, Second and Third Trimesters, 92: 215-36
- Prager, R. A., 1990, "Firm Behavior in Franchise Monopoly Market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1: 211-225
- Rajan, Raghuram G., and Luigi Zingales, 1998, "Power in a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 387-432

- Rindlfeisch, A. and J. B. Heide, 1997,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61(4): 30-54
- Riordan, Michael H. and Oliver E. Williamson, 1985, "Asset specific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3(4): 365-378
- Saussier, Stephan, 2000, "When 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 meet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 test", in *Institutions,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s*, edited by Claude Menar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Segal, I., 1999, "Complexity and Renegotiation: A Foundation for Incomplete Contrac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 57-82
- Shelanski, H. A. and P. G. Klein, 1995,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a review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2): 335-61
- Tirole, Jean, 1999, "Incomplete Contracts: Where Do We Stand?" *Econometrica*, 67(4): 741-781
- Williamson, Oliver E., 1971,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2): 112-23
- Williamson, O.,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of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 _____, 1976, "Franchise bidding for natural monopolies---in general and with respect to CATV",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7: 73-104
- _____,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pitalism*, New York: Free Press
- _____, 1988, "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43(3), pp. 567-591
- _____, 1991, "Comparative Economics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6 (June): 269-96
- _____, 1996, *The Mechanism of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 _____, 2000,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XVIII, No. 3:596-613
- _____, 2002a, "The Theory of the Firm as Governance Structure: From Choice to Contrac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3): 171-195
- _____, 2002b, "Empirical Microeconomics: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Economics of Choice, Change, and Organization*, Mie Augier and James March, eds., Brookfield, Vt.: Edward Elgar, forthcoming
- Woodruff, C., 2002, "Non-Contractible Investments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Mexican Footwear Industry," mime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Zupan, M. A., 1989, "Cable Franchise Renewals: Do Incumbent Firms Behave Opportunisticall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0(4): 473-482.

The Divarication and Amalgamation of 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 Hui-hua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CE) and Property Rights Theory (PRT) which both are branches of 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CE and PRT share the common base in bounded rationality, opportunism and asset specificity, but have serious difference in emphasis and method to solve the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 TCE

mainly attributes the transaction cost of contractual incompleteness to ex post disorder, hence emphasize ex post adaptive governance; contrarily, PRT mainly attributes to ex ante inadequate incentive of specific investment and therefore ex ant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future, TCE and PRT will be well amalgamated if there is the model based on bounded rationality.

Key words: Incomplete Contracting Theory;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Property Rights Theory